

文艺民族化问题的历史性启示

傅 然

本文认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文艺振兴的基本课题。为此,应该从新时代的高度出发,重新学习毛泽东关于中国文艺必须坚持民族特色、独树一帜的论述,从其中领会科学的思想方法、理论基础以及全部问题的内在联系和精神实质,以利提高认识,辨明是非,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运动,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艰难曲折的奋斗,已经进入到新的最关紧要的历史阶段。文艺与民族的命运同在。在这个阶段,文艺振兴的基本课题,应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在“社会主义”性质前,冠以“中国特色”几个字,关系文艺振兴事业之成败,决不可等闲视之。

在探讨这个基本课题时,我们应该时时记住毛泽东当年讲过的话:“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现在看来,很有必要重新学习这一著名论断,认识它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振兴中华文艺的深远意义。因为,它常常容易被其它看来更加紧迫、更加重要的矛盾问题所掩盖。现在,我们有了新的历史条件,又有了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温故而知新,就能对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恍然有所领悟。

(一)

毛泽东为什么那样重视文化艺术的中国特性或民族特色呢?只有把这个问题和毛泽东思想体系及其根本特征联系起来,才能获得深入理解。今天研究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国特色,首先应该从这里受到最根本的启示。

毛泽东一生同党的其他领袖人物一起,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要解决这个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总课题,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原则,离不开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分

析。既要观察判断当今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趋向，又要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和特殊的发展规律，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毛泽东对“中国的特点”、“民族的特点”的研究，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中国的特性”、“民族的特性”以及“民族化”、“民族形式”的重视，都是从这一总课题出发的。毛泽东谈到文艺的民族特性、特色以及中国化、民族化问题，也是这个总课题的组成部分。因此，他的卓越之处，正在于他从全局出发，把这个问题提到了重要的战略高度来考虑。

按照时间先后研读毛泽东著作，就可以看出这一总课题与分课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先应该提到的是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在谈到关于学习的一段话中，他指出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每一表现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后来，他把这段话概括为“论宣传的民族化”。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问世，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节中，他首先把“民族的特性”作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个基本属性规定下来。我们结合“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乃至1840年以来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过程，就可以深知这里高举“民族”的大旗有何等重要意义。这里说的“民族”是相对于国外其它民族而言的，因此，“民族的特性”与“中国的特性”，用语略异而又基本相同。《新民主主义论》已经直接讲到文学艺术问题。其后，经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初，1956年8月24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更集中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民族特色”、“民族化”、“中国化”问题。谈话的内容清楚地表明，他始终是把这个问题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点连在一起考虑的。我们简要地回顾这一理论发展的轨迹，首先得到的最大教益，无疑是思想方法论。只有领会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才能廓清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谬误，坚持正确的方向。这样，涉及文艺民族特色的一系列问题，才有一个总纲贯穿起来。

(二)

本来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和艺术，应该具有自己的民族的特性，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命题。但是，在中国的现当代，这个问题的提出，却有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的意义。

讲到中国近现代历史，有一件每个中国人仍须刻骨铭心的事实，那就是列强侵略、欺侮中国的惨痛历史。在那种条件下，中国社会的诸多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最主要矛盾。“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①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直接威胁着中国民族文化的生存。“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②中国人民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在文化战线上理所当然地要“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所以，毛泽东当年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作出规定时，首先一条就庄严宣布：“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追根溯源，这个问题的提出，一开始就不仅关系到民族文化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且关系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政治方向。“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就意味着它是我们的主体文化，不是别国文化的附庸，不是别的国家的文化可以来主宰或者取而代之的。所以毛泽东明确肯定，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的灿烂文化“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他曾经讲到，抗日战争所面临的困难环境，其中有一条是“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文化艺术的民族性和民族精神，尤为必要。毛泽东满腔热情地赞颂鲁迅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

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回想我们民族百余年的悲壮历史，重读这一段话，不仍然给我们以极大的感奋和极深的启迪么？

其实，毛泽东自己正是这种精神的代表。他的一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在任何外来压力面前屈服，表现出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他坚持认为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这种精神，也正是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够形成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但这一点过去似乎由于某种历史的原因，有些语焉不详，以致不少人尚未充分意识到。其中一个误见，就是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对立起来。其实，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坚决批驳那种错误观点说：“只有政治上糊涂的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才会瞎说我们抛弃了国际主义。”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重大历史转折，已经告诉人们，以为实行国际主义就可以抛弃民族旗帜的想法，那才是真正糊涂的想法。

我们珍视艺术的民族性，致力于艺术的民族化，首先是因为它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相关。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一个曾经饱受欺凌而正在奋起振兴的国家，如果在世界上没有自己的文化艺术的旗帜，没有自己的灵魂和风貌，那还行吗！独立自主是我们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是我们世代都要坚决捍卫的，它作为我们的国策，不能不体现在我们文化艺术的方针政策上。维护文化艺术上的民族独立自主地位，坚持自己的特色，是我们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表现，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对这一点无疑应倍加珍惜。

(三)

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对艺术的“民族特色”问题作了如下基本论断：艺术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这一科学论断，是民族性或民族化理论的基石。

为了阐明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他把人们的思路引向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背景中去，以便大家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中受到启发。如上所述，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的要求看，重视文化艺术的中国特性或民族特色，正是题中应有之意；再从世界各国民族艺术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角度看，民族性是人类艺术在特定历史阶段（漫长的历史阶段）的必然属性。“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③上述两个科学论断之间，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首先要承认世界各民族艺术之间存在共同性。不能把民族艺术的特殊性质和人类艺术的共同本质对立起来看。即使从来未曾交往过的民族，在艺术上也有共同性。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东方人会从古希腊艺术中得到美的享受，而西方人也能对中国的古代艺术赞赏不已。艺术上的共同性是各民族在艺术上相互理解、相互接受、相互融合的客观基础。这是人类生活的一致性在艺术上的体现。揭示这一共同本质，掌握艺术的普遍的基本规律，对艺术实践活动有根本的指导意义。但是，这种艺术的共同性不是抽象的存在。迄今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基本上是以民族（广义）形态而存在的历史，因而，民族艺术不能不是人类艺术存在的基本形态。只要人类的民族结构形态没有终止，艺术的民族特性就不会在世界范围内过

时，而民族艺术的特性，是一个民族的艺术能够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基础。当今世界，那种完全离开了、消除了民族特殊性的所谓“世界艺术”，是根本不存在的。正如毛泽东所说，艺术“总要有民族特色”，这是确定不移的客观法则。

毛泽东在当年同音乐工作者谈论艺术的民族性时，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这时讲的“民族特色”实质上已经是从民族的角度，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基本属性作出的科学规定。这里涉及到艺术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民族性质的关系。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一开始就指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国家民族，在社会主义范畴内，同样也存在着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其共性即存在于个性之中。反映在文艺上，社会主义文艺理所当然要具有民族的特殊性。一事物在与不同的其它事物的联系中，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当今世界各国、民族的文艺，有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的差异，而同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又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当这两方面的属性的统一体形成时，就社会主义而言即是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民族个性而言，它又是具有社会主义共同本质的民族个性。概言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则是我国当代文艺的整体的质的规定性。

这里应该注意，所谓民族艺术的个性。应该是指这个民族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特性。也就是说，民族性不能只是归结为民族形式。因为那样理解，就会忽视其内容方面的民族特性，而它却是根本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过去在理论上似乎发生过混淆，对创作不利，而且会导致对文艺民族性的忽略。我们过去的许多理论著作，往往把民族性和民族文化传统问题放在很不重要的地位，恐怕与这一点不无关系。近年来，一些错误思潮袭来时，它们却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极大兴趣。一方面是全民奋起，振兴中华；一方面却有人起劲地否定民族文化艺术传统和艺术民族性。对这一尖锐的逆反现象，我们许多人却等闲视之。这种状况，值得深自反思！

与此相联系，还有一个特殊问题应该预见到。中国一旦根据“一国两制”原则实现祖国统一后，在我们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中，分别处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社会主义文艺与非社会主义文艺之间，既有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又有民族意识、民族特性上的共同一致。这种情况必将进一步显示出：弘扬民族文化，坚持文艺的民族性，对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增强全民的向心力、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讲，艺术的民族共同性，也不会只是着眼于形式。艺术内容方面的民族特性，如民族精神、民族审美情趣等，有许多还是我们研究不够，涉笔未深的领域。这是我们应该加强探讨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理论上的远见。

(四)

毛泽东每当讲到中国特性、民族特色、或中国化、民族化时，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把它放在中外关系、中外文化交流中去看，包含着“向外国学习”的内容。本来，中国特性、民族特色，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离开了另一方，自身的特性就无从确定。狭隘的民族心理，固步自封，即不知民族性为何物。只有放眼世界各国民族，才能在反观自身中，深刻把握其内涵，才有真正自觉的民族性意识。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论述，同样表现出渊博的知识和宽广的胸怀。

为什么要重视向外国学习呢？这得从近代中国的社会大变革说起。中国的社会变革是世

界近代变革大潮中的一部分。然而中国社会大变革起步晚，已经处于世界列强纷争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要奋起直追，一开始，势必就要向国外先进的东西学习。所以早在这一变革的黎明时期，觉醒了中国人，就纷纷向西方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多次追述过的情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所引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更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在向外国学习这个问题上，一般地讲，“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④别的民族总有我们可学的地方，我们应该择善而从，以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特殊地讲，应当“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我们“很多地方不如人家”。相形之下，我们在许多地方更需要向人家学习，这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的。毛泽东总是说，在学习外国进步文化方面“过去还做得不够”，应当“大量”、“尽量”地吸收。建国后，他更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中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⑤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这里谈到的学习的对象、范围，较之以往更加多样，更加宽广。而学习的根本原则，则是批判地吸收有用的成份，“洋为中用”。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讲的民族性，与狭隘的民族观念根本不同，它具有丰富的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它是以世界文化艺术为背景，在中外交流中存在和发展的民族性。离开了这个前提，当代民族性问题就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新的机制决定，这样的民族性，要消化吸收外来的养料，把它转化为自身内在的东西，如同生物机体的新陈代谢作用一样。外来的养料成为民族文艺内在的因素，便会促进民族性自身在矛盾运动中发展。于是民族文艺之间的外在关系，便转化为民族性的内部关系。

学习外国的好东西，也是多层次、多侧面、多样化的。首先是要学习其基本原理。毛泽东说：“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这是一种高明的学法，灵活的学法，抓住根本的学法，而不是低劣的学法，机械的学法，皮毛的学法。科学原理，是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特殊上升到一般，体现出基本规律的东西，因而具有极大普遍意义。“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分中西。”^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没有国家界限的。但是一旦和国家民族的实际相结合，就要向特殊性转化，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同样，在艺术上，“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以便更好地总结中国艺术中那些不容易讲清楚的规律，推进艺术创作的发展。这又是从一般到特殊。

但是，事情到这里并没有完结。我们参照外来原理总结中国的艺术创造、审美活动的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现时经验，再上升到新的理性的高度，就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人类对艺术的共同本质的认识。这不是一句空话，事实上，几十年来，在中西结合的理论研究中，逐步发现，许多原来认为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实际上还是局部的、低层次的。比如说，在研究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时，就会发现许多外来的理论无法解释。可以肯定，编写世界艺术史，不把东方和中国的艺术放在应有的地位，就不能反映历史的全貌，就不能高度概括人类艺术发展规律。而艺术理论的研究，如果撇开东方和中国的艺术，就不能突破一偏之见，在更深的层次上把握艺术的本质、特征。

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向外国学习，而是学什么，如何学。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既不应排外，象西太后那样反对“洋鬼子”，也不能“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象《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⑦

(五)

基本的趋势“应该是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洋化。”^⑧要保持这一趋势，不应是贬斥外来的东西，而应是强化自己的根基，以便“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要不要“以中国艺术为基础”，“以自己的东西为主”^⑨，这是要不要弘扬民族文化，坚持艺术的民族性的一个分水岭，也是近年来论争的一个焦点。按照某些人的意见，就是要切断历史，以横向移植取代纵向继承。这样下去，结果必将丧失自己的文化艺术。所谓振兴民族的文化艺术，也就成了一句的空话。

这里有个立足点问题。毛泽东当年提倡“有的放矢”，认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了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要解决立足点问题。他对音乐工作者说，“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如果在整体上不以中国的艺术为基础、为主，而以外来的东西为基础、为主，甚至全盘西化，哪里还有中华民族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文艺？按照事物矛盾发展的法则，“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在中西文艺结合中，中国自己的东西能否处于支配地位，决定着艺术的整体性质。

以中国自己的东西为基础、为主，就要尊重自己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中国现时的新文化是从古代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决不能割断历史。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批判地继承传统的文化艺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是发展新文化艺术的必要条件，也是艺术民族性得以保持的根脉所在。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出自《学习》那篇文章的名言。我们应该注意，正是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同志要求：“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便是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及其优秀文化的精华的。

毛泽东在肯定“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以后，接着又说：“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⑩在艺术这个特定领域，不能笼统地说外国的一定比我们高，而是各有所长。人类艺术史上，中华民族有自己辉煌而独特的贡献。凡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将来还会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点。但是中国文艺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较西方晚，西方的许多后起之秀，无疑是我们这一转化的重要借鉴。然而，正如毛泽东所告诫的那样，“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⑪遗憾的是，这种病态心理不仅很早就有，而且在过去这几年，传染尤烈。这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

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是毛泽东早就作过充分肯定的，但他同时也指出过其中的消极因素，就是资产阶级形式的思想方法。很多向外国学习的人，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起了留声机的作用。这种毛病也曾经传染给共产党内的一些人。他们对中国的历史一团漆黑，言必称希腊，对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这种现象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有明显表现。早在30年代，闻一多就发过这样的感慨：“谈到文学艺术，则无论新到什么程度，总不能没有一个民族精神存在于其中。可惜在目前这西化的狂热中，大家正为着模仿某国或某派的作风而忙得不可开交，文艺作家似乎还没有对这个问题深切地注意过。”^⑫抗战期间，郭沫若等人也对这种现象作过批评反省。至于那个宣称中国“自己百事不如人”的胡适的极坏影响，更是勿庸讳言的。正确方向的代表是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毛泽东同志说：“鲁迅

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鲁迅是民族化的。”^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在新文化艺术思想史上对扭转那种错误倾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当年对那种“对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现象的批评，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来照照当今某些人的面孔。不过，那时着重批评的是那种洋八股、洋教条的形式主义向“左”的方面的发展。我们不会忘记，那种洋八股、洋教条的形式主义，还有向右的方面的发展，其极端，就是“全盘西化”论。前一个时期的那种鼓吹“全盘西化”的主张，同当年党内教条主义还有根本不同。这种思潮的极端代表者，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又不顾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实际；既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又否定文艺的民族特性；既要割断中国的历史，又要抛开西方进步的文化传统。他们已经不屑于“言必称希腊”了，而是热衷于当代西方社会的某些病态现象。他们也打出“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但他们能够拿出来的却只是某些新的洋八股、洋教条而已！

毛泽东当年语重心长地说：“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⑬同时，他一生还反复强调，对文化遗产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应该向前看，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他指出，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在创作上继承遗产只是作为借鉴。应该在人民生活中吸取原料，进行新的创造。在当代社会和文艺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在继承和革新创造的矛盾运动中，民族性是在发展的。作为中西结合的基础的中国文艺，它本身也在演变。如果我们孤立、静止地去看，那是不符合毛泽东的观点的。而且“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⑭，实际上，某些人奉为新教条的东西，在人家那里已经不新了，还是不要盲从的好！

（六）

毛泽东坚持文艺的民族特色，其意义不只在于本民族文艺的发展，而且关系世界文艺的合理结构。他说：“地球上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⑮如果说，前面讲的“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意在阐明艺术必然要具有民族形式、民族风格，那么，这里强调的，则是只有多样化才能满足人类的审美需求。其中蕴含着对东西方艺术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的公正评价，以及对人类艺术的发展前景的科学预见。

辉煌的人类艺术史，是东西方各民族共同写就的。每一民族的独特创造，都是对人类艺术宝库的贡献，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则共同促进着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如果说，在封建时代，由于民族间的远离，难免产生自我中心的感觉，那么到了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展，西方文化艺术以崭新的形态，凭借非艺术的种种优势，向外伸展，而东方文化艺术则处于弱势，文化艺术的交流发生了强烈倾斜，于是“西方文化中心论”便应运而生。东方文化艺术不仅在西方许多人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了解和重视，而且在东方一些人中间也得不到充分的珍重，甚至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情绪。这是文化艺术史上的一幕悲剧。值得庆幸的是，当代世界的发展，已使这一幕正在成为过去。毛泽东说：“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⑯建国初期讲的这番话，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检验，现在不更清楚了么。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⑰在这个使人感到惭愧的“长时期”以前，中国人有过“灿烂的古代文明”。现在，这个“长时期”的低谷阶段已经过去，但是走向高峰还任重道远。每一个有历史的责任

感和时代的紧迫感的中国人，在这个关键时刻不能不深深地感到，那种华夏文化“衰亡”论、“大换血”论，是多么地涣散人心，是多么地有背于炎黄子孙和世界有识之士的希望！

凭着中华民族几千年聚积起来的高超的审美创造力，凭着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化艺术的先驱者们的奋勇开拓，趁着新时代的浩荡春风，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再展宏图，在文化艺术上同样作出无愧于祖先无愧于人类的贡献。所以毛泽东鼓励我们的艺术工作者说：“特别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⑩ 这就是要标时代之新，立民族之异。

在世界广阔的文艺天地里，各国家民族的艺术也应该百花齐放！中华民族的艺术应当在其中独树一帜，与其它民族的优秀艺术竞相辉映，“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⑪，新艺术。

独树一帜，就要有独创性，它的源泉和动力，是我们民族在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伟大长征中形成的越来越丰富的生活和精神风貌。同时在艺术上，还要像毛泽东说的那样：“中国的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结合”，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艺术，以“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毛泽东以鲁迅为榜样，指出：“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⑫ 以创作而论，我们的艺术要改革，要创新，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现在讲的“民族特色”，自然是赋有时代精神的现代特色。

这一切，都有一个根本的宗旨贯穿其中，“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⑬。在当今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中国艺术，之所以能够异彩纷呈，它的光源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几个大字。在这一宗旨下，我们自己的艺苑中，自然应该是百花齐放的。唯其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对人类艺术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1991年5月

注释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6年4月20日。

②④⑨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③⑥⑧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㉒⑤⑦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㉓ 闻一多：《悼玮德》

㉔⑬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1956年11月12日。